

收稿日期:2026-03-05

文化符号权力影响下的社会秩序 与乡村文化发展分析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符号权力是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个体在建构社会秩序中能够获得更多资源分配权并享受资源受益的权力。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个体都倾向于拥有更多的符号权力。但打破既有并重塑新的社会结构,从而改变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并不容易。处于社会秩序不同层次的个体在寻找新位置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样态,但每种样态都是个体自身素养与他者博弈的平衡态。因此,符号权力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分配权、受益权和发展权。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村民是发展文化符号的主体,但符号权力需要通过集体认同表达出来,并通过行政意志转化为发展乡村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乡村文化,需要基于符号权力构建文化地标,基于文化符号发展文化产业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在乡村社会蓄积经济资本并提升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率,激发乡民发展文化的愿望。

关键词:符号权力;乡村文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空间布局;发展转向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4-0051-16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空间拓展力的生成逻辑与村民的文化创新主体意识研究”(HB23MK018)。

作者简介:孟祥林(1969—),男,河北保定人,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公共事业管理与社区治理、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4.005

一、引言

(一) 符号在建构自身中呈现文化的方向引导力

从符号学层面看,所有的传播均包括符号和符码两种要素,前者是人为规定的能够代表一定意义的制品和行为,后者则是建立在一定规则基础上的为社会成员所共识的符号系统。人们生活在符号中,符号构成有潜在意义的系统,经过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主体解读而被激活。符号是一种话语方式,每一种话语方式都代表具体的利益。因而符号作为能够代表利益主体的一种权力,代表着具体人群的利益,符号中隐含着利益主体对利益的诉求,表达着利益主体需要

传达的声音,通过群体接受这种符号,从而在符号的扩大再生产中让利益得以实现。符号存在于一定的环境当中,每一种符号环境也具有对世界观的整合和同化作用。

基于符号交流信息和表达意愿是人类共同特征,随着时代进步,符号的传播形式和规模等都在发生新的质变,符号形式的生产、复制,以及传播的规模也都在发生变化。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建立在符号体系基础上,符号成为处于社会体系中的人群、个体之间表达意愿和传达信息的暗语,通过影响社会群体并通过社会群体的传承而成为富有区域特色的文化。文化借助符号系统在承继过程中,需要做到编码能力与解码能力的对称,符号中蕴含的意义据此才能被解读出来并且成为符号信息接受者改造世界的现实生产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不仅是表意系统而且是一种建构现实的权力,是一种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社会群体在这种符号系统中建构社会并建构自身。当然,在社会变迁中,这种权力可能会被削弱,但削弱后的符号权力会被新的同样具有强大权力的符号所替代,人们仍然需要沉浸在符号中,通过符号表达自己 and 与他者建立联系。符号权力中体现着话语的张力^[1]。

人类的知识通过话语获得,任何事物都要通过话语建立联系,在话语中传达信息并在话语中彰显主导话语的权力,这就是文化的规范力和引导力。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也就意味着社会团体或者社会组织将其预期要为社会建立的规范传达于社会,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其他社会团体或者社会组织所共识。从符号权力角度看,符号系统是一套知识工具,用以塑造社会结构并被社会结构塑造。因此,符号权力从对社会影响的角度看是“建构的建构”^[2],从受到社会影响的角度看是“被建构的建构”。

(二) 符号权力建构文化资源的分配方式

符号在建构社会秩序过程中强大自身^[3]并产出信息贡献社会,在此过程中规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符号权力是一种建构现实的权力^[4],在理解符号权力过程中,不能将符号权力下降为“沟通关系”^[5],必须认识到符号权力是超越知识工具之上的一种支配手段。符号系统在这样的逻辑中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内化到自身之中。符号权力中隐喻着这样的含义: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护依靠的是一种隐而不见的沉默的“暴力”。“符号暴力”也是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中很抢眼的字眼。“符号暴力”规范着表象世界背后的普遍必然性,在你认同或不认同、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都会存在,人类在个体行动中贡献着文化的建构并转而形成集体行动,文化思想力在这种建构中成为形塑社会的现实生产力。符号作为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既是资产也是资本。

符号作为资产,其内容可以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通过传播、继承、交易扩大影响力;符号作为资本,符号在建构社会秩序进程中的张力可以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符号在这样的逻辑中,影响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并在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进程中产生更强大的力量,决定着文化资源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方式,以及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在布尔迪厄看来,所有的符号商品或者符号材料都会被认为自身具有独特性并值得在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被追求^[6]。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将教育乃至文化视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资本形式^[7],从资本的角度考虑权力的生成和传递,从而实现某个群体或者个体对其他群体或者个体的支配和控制。

从文化资本形成的历史逻辑看,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总是带有家庭的痕迹,并且总是带有最初生活形态的烙印,这可以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等表现出来,而这种印记是无法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掩饰的,社会秩序中处于不同位置的成员无法从这个带有印痕的并且对其起着决定作用的早期获得的社会位置中脱离出去,这是其展开生活的逻辑起点,也是影响其生活轨迹的一种无法摆脱的隐含力量,其中既包括向前走的“推力”,也包括让其沿着

既定轨迹走的“拉力”。在这样的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个体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得到确认和再生产。文化资本的长期生产和传承的结果是社会位置的结构性同源,与社会成员的心智结构相对应并形成对应的空间结构。乡村场域内的文化建设是在符号权力意义上建构和拓展文化空间的过程,乡村文化具有区域性、传承性、时代性,有关乡村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从文化符号权力的空间布局和符号资本角度进行审视的研究相对较弱,从该角度展开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地探析符号权力,能为构建乡村场域内文化建设的形成机制和找到阻碍乡村文化发展的解决办法开辟道路,因此基于符号权力视角审视文化资本进而探索乡村文化的发展路径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符号资本的建构与符号资本化的个体在场域中的布局

乡村场域内社会网络的建构在本质上就是符号筛选与建构,以及基于符号进行对话的过程。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完善乡村社会秩序以及在该秩序上决定不同个体的位置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乡村发展需要理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间的关系,并且重视文化资本决定经济资本进而再度决定文化资本的力量,个体由此可以判断自身改变其在乡村秩序中所处位置的努力方式与可能性,从而规划人生未来和成长路径。个体由此可以汇聚贡献社会的智慧以及将文化符号显性化为经济成长力的方式。

(一) 个体在知觉图式中建构自身和贡献社会

人们的认知方式基于以往的经验 and 家庭教育产生,并在后期不断介入社会交往过程中建构自身的认知图式,从而形成稳定的心智模式,这又会进一步成为递延文化资本和壮大符号权力的基础^[8]。在该逻辑中,家庭教育的不平等性经过学校教育而被合法化,这种基于纵向发展的文化资本积累进而促使竞争力的结果不断强化,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在这个逻辑上,社会秩序是在符号权力循环累进过程中得以形成和逐渐强化的,处于社会系统中不同位置的社会成员,因符号权力差异而使其从社会体系中分配资源的能力存在差别,因此其视野中的世界存在差别,社会成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自身认知能力相适应的知觉图式,并将自身归为相应的人群中,继而形成了相应的人群分类图式。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中,社会个体的文化需求水平、文化鉴赏力,以及文化创造力等都是社会教化的产物,因此心智模式是按照社会结构的调整定型的。社会个体生活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会不断与外在的社会规则打交道,进而将社会结构图式内化为个人的性情与惯习。人们在论及与个人文化修养相关的论题时,往往只注重文化修养目前的样态即结果,而忽视该文化修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而悬置了社会个体的文化修养须经由合法的文化形式的翻译才能形成的事实,也就遮蔽了社会个体基于文化资本或者符号权力强化既定社会等级结构的最终目的。

社会个体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惯习”将个体的心智发展与其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对应起来,社会个体在教化中接受社会秩序并形成对社会规则的信奉,在既有社会秩序中建构自身并进一步建构社会秩序,据此形成“我”与“他”之间的界线,社会个体在这个界线以内创造自己并生产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社会个体的生存空间并非社会给予而是自己建构起来的。社会个体在社会秩序中形塑自身而形成的语言习惯、行为方式等,都成为个体在社会系统中得以区分并表明自己是谁的标志,但是文化对社会个体的这种影响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文化作为一种支配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力量悄然无声地发挥作用,巩固着既有的社会秩序并再生产出社会成员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

任何社会个体对其环境的感知从来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包含着建构原则的认知活

动,即社会个体都通过张扬的个人主观意识建构生存环境并被生存环境所建构,因此符号权力是“建构中的建构”,也是“被建构的建构”,即每一社会成员的存在样态是以其生存环境中诸多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函数,同时该社会成员也是构建其他社会成员这个函数的自变量。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一种“误识”,即社会个体在认识世界和建构世界的过程中,暗含着对社会秩序的绝对形式的认同。社会个体在既定秩序下建构着自己,拥有符号权力的社会个体始终处于社会秩序的高层,而处于社会秩序较低层次的个体改变自身处境并达到社会秩序高层和拥有符号权力的难度较大。因此,文化作为能量流总是从高势能处流向低势能处,并将处于低势能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同化。社会成员为了改变既定社会秩序中的知觉图式,在这个链条中逆序前进达到高能位置,就需要强化自身的文化内涵,以便成为具有更大符号权力进而能够获得更多文化资源的个体。

(二) 文化符号权力借助经济资本得以显性化

在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关系中,经济资本一直作为显性的东西存在,这个显性的东西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作为隐性的东西控制着显性的东西。在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后,文化资本在社会发展中反而成为能够控制经济资本的东西,这个隐蔽在经济资本背后的能够控制经济资本运行方向和运行样态的东西被显性化。因为文化资本成为符号权力的物化的东西,所以对符号权力的掌握程度就成为拥有资源分配权,从而在建构社会秩序过程中拥有竞争力的基础。经济逻辑转而成为文化逻辑,又进一步转化为符号逻辑,符号逻辑就是对社会资源分配权的逻辑进而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逻辑,这种社会秩序反过来又进一步助推了符号逻辑以及作为建构符号逻辑的其他各种逻辑的基础得以巩固。文化资本总是作为一种底层的决定经济资本发展样态的力量决定着经济资本的存量和增量。图1表达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符号权力间的关系。图中的横轴表示经济资本,向右为经济资本增加的方向;纵轴表示文化资本,向上为文化资本增加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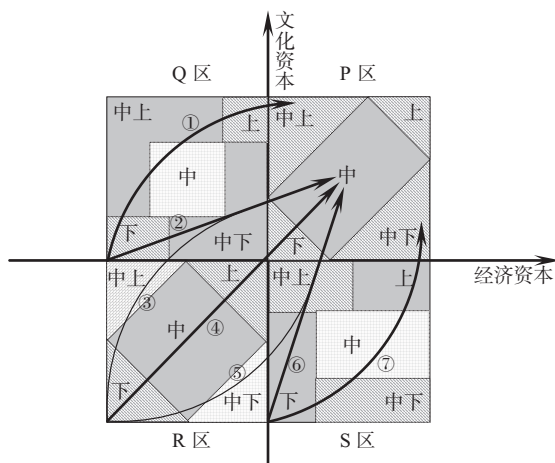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符号权力的关系

为了叙述方便,分别将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定义为P区、Q区、R区和S区,分别用 Q^Q 、 R^R 、 S^S 、 P^P 表示处于Q区、R区、S区、P区中具有既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个体。 P^P 代表具有较好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组合状态的位置。 Q^Q 、 R^R 、 S^S 为了改善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就有不断向P区前进的愿望,即使在P区以内,由于区域内不同位置上具有的符号权力存在差别, P^P 也有不断向右上方前进的愿望。 Q^Q 、 R^R 、 S^S 不断向P区前进的前提是具有较大

的经济资本增量, Q区和R区内个体的经济资本存量都相对较低, P区内靠近区域左下角的 P^P 经济资本优势也不明显, 只有扩大经济资本增量才有进入P区的可能。符号权力因成员个体在社会秩序中位置的重新建构而得到布局调整。符号权力虽然总是隐蔽地发挥作用, 但符号权力的载体却在发生变化, 由最初的经济符号逐渐转变为文化符号, 社会资源的分配也由经济分配转化为文化分配, 而文化分配乃至文化符号权力最终在经济权力层面得到体现。

(三) 符号权力在场域中的空间布局

在图1中, Q区、R区、S区中的个体向P区前进的目标在于争取更多的符号权力。为了更好地说明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发展趋势, 将P区、Q区、R区、S区中的个体细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等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个体拥有的符号权力的布局在图1中以阴影部分的面积表示。如图1所示的各区中, “上”和“下”的面积占比都不大, 主要部分是“中上+中+中下”, “中”在“中下+中+中上”的面积中占比最高。为了拥有更多的符号权力, P^P 、 Q^Q 、 R^R 、 S^S 中处于“下”状态的个体都有愿望发展为“中”“上”状态的个体。图1刻画了几条典型路径: 一是 Q^Q 的“ $Q^Q \rightarrow Q^{中}(Q^{中上}) \rightarrow Q^{中上} \rightarrow P^{中上}$ ”发展路径; 二是 Q^Q 的“ $Q^Q \rightarrow Q^{中下} \rightarrow P^{中}$ ”发展路径; 三是 R^R 的“ $R^R \rightarrow R^{中上} \rightarrow Q^{中下} \rightarrow P^{中}$ ”发展路径; 四是 R^R 的“ $R^R \rightarrow R^{中} \rightarrow R^{中上} \rightarrow P^{中下} \rightarrow P^{中}$ ”发展路径; 五是 R^R 的“ $R^R \rightarrow R^{中下} \rightarrow S^{中下} \rightarrow S^{中上} \rightarrow P^{中下} \rightarrow P^{中}$ ”发展轨迹; 六是 S^S 的“ $S^S \rightarrow S^{中上} \rightarrow P^{中下} \rightarrow P^{中}$ ”发展路径; 七是 S^S 的“ $S^S \rightarrow S^{中下} \rightarrow S^{中} \rightarrow S^{中上} \rightarrow P^{中下}$ ”发展路径。

七条发展路径的目标都是发展成为P, 但是不一定会成长为 P^P 、 $P^{中}$ 、 $P^{中上}$ 、 $P^{中下}$ 甚或 $P^{中}$ 中的某种状况, 一般都会停留在发展路径上未进入P区的某个节点上。这就意味着发展路径中会存在多种状态, 这些状态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这就意味着 Q^Q 、 R^R 、 S^S 会停留在第二象限(Q区)、第三象限(R区)、第四象限(S区)中的某个位置, R^R 甚至不能成为第二象限或者第四象限中的因素。因此, 基于历史逻辑形成的符号权力决定了社会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又进一步影响着该个体在社会秩序中建构自己的生态位。从这个逻辑中可以深入理解“符号权力”是“建构中的建构”和“被建构的建构”的意思。社会个体不仅建构自身, 也建构“他者”, 同时也在被他者建构。在发展轨迹上, 每前进一步都是在与“他者”博弈中进行的。社会个体都在博弈中通过扩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扩展符号权力, 同时不断壮大由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资本实力。因此, 个体在发展轨迹上的任何一种样态都是与他者博弈的暂时平衡态, 这种平衡态会因为扰动因素马上被打破, 从而进入新的暂时平衡态。

(四) 个体在符号场域中的成长路径

图2示意了P区、Q区、R区和S区内个体的分层。纵轴表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总量增加的方向。从图2可知, 表示下、中下、中、中上、上等各层次的条柱与表示P区、Q区、R区、S区的曲线并非垂直交叉关系, 各条柱向右方倾斜。这就意味着, 各区内处于相同层次的个体, 在同等级别情况下沿着“S区→R区→Q区→P区”的顺序, 各个体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量”在逐渐增加。这就意味着, 处于较低层次的个体如要赶上同等类别的较高层次的个体就需要有更大付出。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问题, 图2中将各区对应的曲线区分为 L_1 、 L_2 、 L_3 、 L_4 等四个层次, 从图中可以看出, P区的中、中上和上总是处于最高位置, 从而具有很强的符号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区内的个体就不能与P区中的个体平齐。例如在 L_1 与 L_2 之间的区域, Q区的“中上”和“上”可以与P区的“中”平齐; L_2 与 L_3 之间的S区的“上”、R区的“上”、Q区的“中上”、Q区的“中”可以与P区的“中下”齐平。这样就能够给Q区、R区和S区中的个体的前进创建发展通道。根据这样的发展逻辑,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总量在弱势区的“上”或者“中上”层次可以

与强势区的“中下”或者“中”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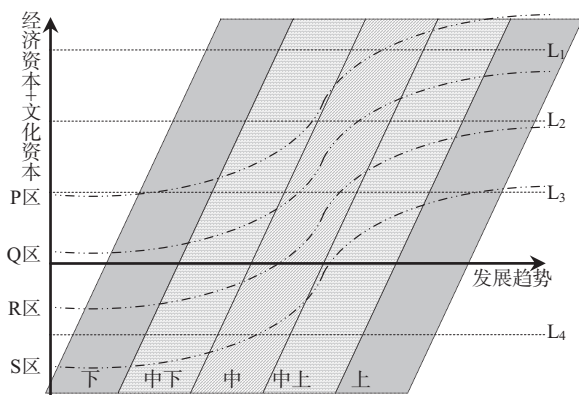


图2 P区、Q区、R区和S区内个体的分层

据此可知,在图1中处于“相对的左下方”位置处的个体若想达到“相对的右上方”位置,就需要有更大的付出。图2在理论上构建了从“相对的左下方”到“相对的右上方”位置前进的通道,但是这个通道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根据不同场域内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空间布局及发展样态确定。符号权力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场域中符号权力的布局呈现动态发展趋势,场域中处于低层次的个体具有上升的通道,但只有在其具有足够力量能够打破既有符号权力秩序,才能在建构起来的新秩序中达到“相对右上方”位置。虽然既有秩序不一定能够被打破,但能够冲破既有秩序的制度准备也非常重要,因为据此才能让处于“相对的左下角”位置上的个体具有达到“相对的右上方”位置的希望,并为这个希望不断完善和强大自身。

三、文化资本布局与符号权力的持有和转向

(一)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持有样态与个体成长轨迹

根据前文,如果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比率”定义为“转化率”,在该基础上将 C^P 、 C^Q 、 C^R 、 C^S 界定为 P^P 、 Q^Q 、 R^R 、 S^S 的转化率。 P 区内的社会个体 P^P 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转化率一直保持在高位, P^P 依托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具有最强的符号权力,处于社会秩序的最高层。 P^P 的发展线 C^P 是逐渐变得更加陡峭的增函数,这就意味着在发展进程中,经济资本的积累速度和文化资本的积累速度都呈加速发展趋势,发展后期的转化率更高,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转化的通道更加宽敞, P^P 具有更强的文化引导力,从而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控文化符号权力,基于文化资本反馈的经济资本的力量也在增加; Q 区内的社会个体 Q^Q 具有较弱的文化资本且不具有经济资本优势, Q^Q 具有较弱的文化符号权力。

从图3可以看出, Q^Q 的发展线 C^Q 比较平缓, Q^Q 为了改变自身的存在状况,首先需要做的是积累经济资本,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生活日常为核心的改变基本生存状态的追求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当经济状态有所好转后,即 C^Q 到达M点并且达到第一象限后,经济资本状况有所好转,但转化率仍保持在低位,文化资本的持有量并不高,因此 Q^Q 在M点以后持有文化资本的愿望虽然在增加,但文化资本的现实持有量并不高。 R 区的社会个体 R^R 无论在经济资本方面还是在文化资本方面都不具竞争力,但这并不影响 R^R 具有获得文化资本的愿望,现实中 R^R 仍然付出巨大努力沿着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上升的通道 C^R 前进。从图3可以看出, C^R 虽然也是增函数,但 C^R 是向上弯曲的“初期陡峭但后期平缓”的曲线,这说明社会个体虽然也在努力争取文化资本的持有量,但现实中却将主要精力奋斗于争取经济资本。在图3中, C^R 即使在N点以后很快越

过第四象限到达了第一象限,但持有的经济资本数量也非常有限,并且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可能性也不高; S^S 区的社会个体 S^S 的成长轨迹是 C^S , S^S 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但文化资本持有量较低。 S^S 全部努力主要是在争取更多的经济资本,在 C^S 越过 W 以后,在文化资本获取方面具有较强的追求,但相较于 P^P 而言不具有任何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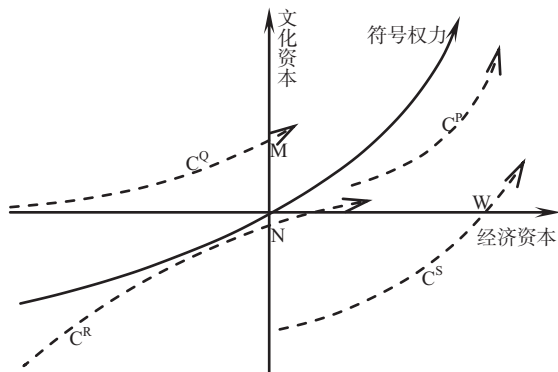


图 3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持有样态与个体成长轨迹

如上四个分区中,符号权力沿着“符号权力”发展线曲线增长,但由于不同分区中社会个体成长路径存在差别,会在“符号权力”曲线发展轨迹的不同的点上终止,处于与自身能力相合的平衡态。不同分区内社会个体的发展愿望、发展基础不同,沿着各自的发展线前进过程中均存在其发展阈限,挣脱既有秩序的能力存在差别,从而达到的高度也存在差别。 Q^Q 、 R^R 、 S^S 为了改变在既有秩序中的位置,先要达到图 1 或图 3 中第一象限靠近原点的位置,这时才拥有成为在第一象限“相对的右上方”位置的 P^P 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量的积累的基本条件,也只有在这时, Q^Q 、 R^R 、 S^S 才能具有达到“相对右上方”位置的社会个体的信心,从而使得重构符号权力的社会秩序具有了可能。

(二) 个体成长轨迹的替代性选择与符号权力预期

在图 4 中, P 区、 Q 区、 R 区、 S 区的社会个体持有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量不同,虽然都会具有较大的愿望持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但因发展基础和能力存在差异,所以在发展轨迹线上达到的位置也会存在差异。在图 4 中, C^{PY} 、 C^{QY} 、 C^{RY} 、 C^{SY} 是经济资本能够以较快速度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发展线,而 C^{PX} 、 C^{QX} 、 C^{RX} 、 C^{SX} 是经济资本以较温和的方式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发展线。 P^P 无论沿 C^{PX} 线还是沿 C^{PY} 线发展,都具有较高的转化率,并且在 P 区中处于较高的位置,该位置是 Q^Q 、 R^R 、 S^S 等无法达到的高度。 C^{PX} 与 C^{PY} 分别经历先快后慢和先慢后快的发展轨迹,前者表明 P^P 的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受到一定限制,存在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转化的瓶颈,在文化资本的持有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持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C^{PY} 则表明 P^P 的经济资本达到一定量时,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率急剧提升, P^P 具有的符号权力于是保持较高水平。在 Q 区、 R 区和 S 区内, Q^Q 的两种选择中,会倾向于 C^{QX} ,由于经济资本相对薄弱, Q^Q 不会具有很强的转化率预期,其持有的文化资本量也会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

在 S 区, S^S 具有较强的经济资本实力,希望通过较高的转化率得到较多的文化资本,以便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并且在经济发展方面得到更多来自文化资本的反馈。在 R 区, R^R 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不占优势, C^{RX} 的选择是优先发展文化资本, C^{RY} 的选择是优先发展经济资本,前者通过 Q 区到达 P 区,后者通过 S 区到达 P 区,但两条道路的结果均为在 P 区靠近原点的位置停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P^P 会在 C^{PX} 与 C^{PY} 中选择 C^{PY} ; Q^Q 会在 C^{QX} 与 C^{QY} 中选择 C^{QX} ; R^R 会在 C^{RX}

和 C^{RY} 中选择 C^{RX} ; S^S 会在 C^{SX} 与 C^{SY} 中选择 C^{SX} 。社会个体作出这种替代性选择的前提是自身获得符号权力的实力和愿望。社会个体都倾向于通过文化资本对经济资本的替代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本,因为文化资本意味着在建构社会秩序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权力,文化资本受经济资本控制,但达到一定程度时对经济资本的布局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因此,社会个体都会倾向于文化资本对经济资本的替代。P区、Q区、R区和S区分别对应着大资产者、知识分子、工人阶层、小资产者。如果用 Z^1 、 Z^{21} 、 Z^{22} 、 Z^{31} 、 Z^{32} 、 Z^{41} 、 Z^{42} 等区域分别表示不同类型的社会个体所能达到的高度,则大资产者、知识分子、工人阶层、小资产者等均有不同的生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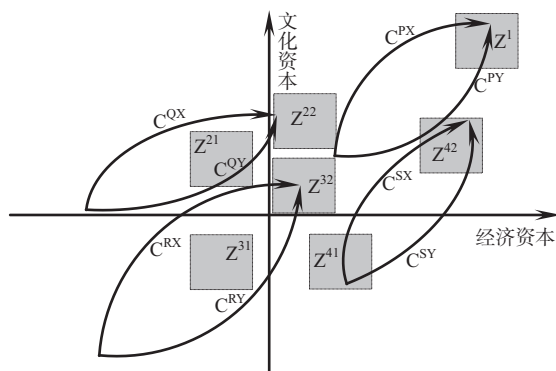


图4 个体成长轨迹的替代性选择与符号权力预期

大资产者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也具有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实力,绝大多数的 P^P 可以达到 Z^1 ; Q区的绝大部分 Q^Q 会位于 Z^{21} , 少部分会达到 Z^{22} ; R区的大部分 R^R 会处于 Z^{31} 的位置, 少部分能够达到 Z^{32} ; S区中的 S^S 主要位于 Z^{41} , 少部分会达到 Z^{42} 。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 Z^{22} 、 Z^{32} 、 Z^{42} 在P区内,但永远不能达到 Z^1 的高度。但 Z^{22} 、 Z^{32} 、 Z^{42} 已经为社会个体向 Z^1 前进奠定了基础,具有了按照 C^{PX} 或者 C^{PY} 的路径达到 Z^1 的可能。

(三) 符号权力持有者与乡村社会主体的符号权力追求

根据前文, P^P 才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换率越高,文化发展的话语影响力就越大,能够前瞻性地创造文化发展需求并通过相应的建构措施实现这种需求。Q区、R区和S区中的 Q^Q 、 R^R 、 S^S 等都是 P^P 的跟进者,这些个体拥有的符号权力很弱或者不具有符号权力,不具有话语影响力或者话语影响力不高,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个体都将追求的重点放在经济基本层面,因为经济资本弱从而不具有更多的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愿望,因此绝大多数只是文化发展的追随者。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主体也大体存在这样的成员分类,绝对少数属于 P^P ,只有 P^P 层次的社会主体才具有充分话语权,具有强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实力,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推者和引领者。社会个体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量是在历史积累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基于历史逻辑形成的社会秩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处于Q区、R区和S区的个体想超越目前状态达到P区中靠近右上方的位置并不容易。

社会个体提高转化率的前提是提升经济资本的存量和增量,然后在保证经济资本能够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经济资本的基础上,提升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比率。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并非终极目标,文化资本通过壮大符号力量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并具有扩大再生产经济资本进而建构社会秩序的权力才是目的。文化资本具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结果是:既有社会秩序不易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不易被重建。社会个体持有的文化资本量存在差异,进而拥有的符号权力存在差异,因此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是处于P区的 P^P 。因此,在乡村文

化建设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个体都在跟着 P^P 走, P^P 的思维方式、文化需求等决定乡村社会文化的发展样态。为了高效率发展乡村文化,就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文章:其一是发掘乡村社会主体中的 P^P 个体。 Q^Q 、 R^R 、 S^S 不具有表达愿望的积极性,也不具有更多改变既有位置的愿望。乡村社会中先富裕起来的个体以及新乡贤等可以作为 P^P 个体,这些个体具有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具有持续扩大再生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能力,是影响乡村社会发展样态的重要因素。其二是为 Q^Q 创造积累经济资本的通道。知识分子阶层具有较为丰厚的文化资本,但经济基础较薄,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通道较窄,同时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不强,但该群体具有发展乡村文化的智慧,乡村文化产业化以及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实性, Q^Q 在经济资本丰厚并具有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通道后,可以进入P区并处于P区中较高的位置。其三是为 S^S 创造积累文化资本的通道。 S^S 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但文化资本基础较薄。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转化的通道狭窄或者 S^S 的文化资本积累愿望不高,都是 S^S 不能突破自身既有发展状态的重要原因。在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管理主体要向 S^S 灌输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并创造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通道。提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互转的可能性,只有基于文化资本的经济资本才是更为稳定的经济资本,并助推经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其四是为 R^R 创造转化条件。 R^R 存在三条转化路径,即首先转化为 Q^Q 而后进入P区,或者首先转化为 S^S 而后进入P区,或者直接进入P区,但初期会处于P区靠近坐标系原点的位置。如上三条途径中,第二条路径的可能性较大。 R^R 首先需要改变其经济状态,而后才会考虑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进而积累经济资本。其五是延长文化实体经济产业链。以文化产业为节点整合其他相关产业,在让乡村社会主体意识到文化力量的同时,不断打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通道,使村民从发展乡村文化的观望者转变为参与者、主推者和受益者,从被动参与转为主动参与和积极跟随。文化资本积累不再是乡村个别主体的自觉,而是乡村社会的集体认同。

四、文化符号权力主体分层、文化资本形态及文化传播隐喻的权力关系

(一) 文化符号权力主体分层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建构

乡村场域内文化符号产生的主体是村民,乡村文化基于乡村产生并进一步丰富乡村社会生活。虽然如此,乡村社会主体并不均等地具有符号权力。根据前文,极少部分处于 P^P 状态(第一层次),少部分处于 Q^Q 、 S^S 状态(第二层次),多数乡村社会主体处于 R^R 状态(第三层次),每个层次的社会个体又会因为自身具备的综合条件进行细分。上述三个层次的乡村社会主体的文化贡献和文化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是第一层次。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具有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具有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进一步汇聚文化资本的愿望,希望通过发展文化资本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能够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创造力和牵引力。但 P^P 因具有强大的符号权力,在发展乡村文化进程中,会按照个人意志规划乡村文化发展秩序,从而脱离民众愿望。乡村文化的发展方向 and 空间布局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P^P 的愿望,乡村文化的大众潜在需求与小众意愿实现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乡村文化的发展只能反映部分乡村社会主体的意志,影响乡村社会大众群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其次是第二层次。该层次的个体,或者缺乏经济资本,或者缺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率不高,希望通过文化资本引领经济资本增加的愿望也不够高,第二层次中更多的个体仍然会将关注点放在经济资本层面。因此在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元素转化为经济竞

争力的程度决定了个体发展文化的愿望。当更多个体将关注点从发展文化层面转向发展经济,乡村文化就会变得荒凉。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 Q^Q 、 S^S 、 R^R 会成为“在场的不在场”,发展乡村文化的政策宣传以及与 Q^Q 、 S^S 、 R^R 的经济状况改变不存在直接关系的措施不会具有生产力,人们关注的是近期收益而非文化长期发展带来的整体环境的优化,缓慢的环境变化与人们改变生存样态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不对称,也削弱了 Q^Q 、 S^S 、 R^R 对积累文化资本的需求。

再次是第三层次。该层次的个体既缺乏经济资本也缺乏文化资本,如果说第二层次的个体仍然具有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可能性,那么第三层次个体的这个可能性变得很低。个体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实体经济方面,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基础薄弱,在乡村文化发展中只能作为文化发展的跟随者,也缺乏智慧贡献和发展要求。在行政意志融入乡村文化发展格局过程中,行政力量作为符号权力主体在乡村文化发展的时空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行政意志主导的文化单向植入会偏离乡村社会主体的文化需求,文化场与村民的生活场不能完美套叠在一起,因而不能激发村民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当中。乡村文化是当代人与祖先进行对话的通道,祖先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庙场节庆、方言土语、服饰美食、古老建筑等都是承载文化信息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村民生活在承载文化的容器中,也在通过自身实践不断丰富着容器中的内容。

乡村社会主体虽然是发展乡村文化的主角,但需要在行政意志主导下凝聚乡村文化人才,不断张扬乡村文化符号的影响力。符号权力并不由村民个体掌握,而是通过村集体乃至乡镇政府的力量展露文化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张力^[9]。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刻写空间、制度空间等都是储存乡村文化的虚拟空间,发展乡村文化,需要在行政力量引导下为 Q^Q 、 S^S 、 R^R 筑牢虚拟空间,为乡村社会积累经济资本以及积累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生产力,模糊符号权力主体间的边界,使更多乡村社会主体拥有表达拥有符号权力的愿望和拥有符号权力。

(二) 文化资本形态与社会个体结构的建构

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态:对象化形态、个性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第一种形态以书籍等各种文化产品方式呈现,第二种形态以个体所拥有的技能和才华等方式呈现,第三种形态以个体所持有的文凭方式呈现。文化的力量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文字是表征文化的符号,人们对文字的崇拜表达了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引领人们行为方式的张力。文字中的谶语、符咒、避讳,以及文字狱等都让人们从文字中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

文字崇拜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字蕴含的引领、规范、倡导等含义的文化魅力,也在于文化资本具有的文化再生产能力,以及影响个体在社会秩序中所处位置的能力,说到底来自对文字所表征的传统审美文化的崇拜,这种崇拜会在代际间传承和放大,并在审美中形成集体认同^[10],在一致性的价值观中壮大文化资本的价值,基于以往经验对自身发展进行判断和重构,增长、维持或者突破既有社会秩序固化的符号权力,社会个体拥有的符号权力据此得到积极强化或者消极强化,符号权力在建构和壮大过程中使符号权力主体成为“建构中的建构”的元素,使符号权力客体成为“被建构的建构”的元素。

在这样的逻辑中,社会个体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并在自身意志外化过程中处理与其他个体的关系,希望自身拥有更多的符号权力,社会个体在文化崇拜中蓄积能量,进一步优化自身在既有社会秩序中的位置,重新建构与其他个体间的关系,在改变自身状况过程中展现符号权力的张力。人们对文化资本的崇拜说到底人们基于文化资本对个体后续发展权的担忧,以及基于文化资本所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和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社会个体在博弈中建构自身,并在这种成长逻辑中为后续发展拓展空间,拥有更多的符号权力成为社会个体的发展希望,并据此建构

社会个体的结构。

(三) 乡村场域内文化符号权力的延伸和生产

1. 文化传播主体按照有益其自身的方式运作

前文论及,符号权力是一种基于历史逻辑形成的和在既有社会秩序中相对稳定的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社会成员总是希望拥有更多的符号权力,从而处于社会秩序的高层,并进入符号权力的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轨道。布尔迪厄认为,在某个既定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内的文化资源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作^[11]。社会个体是在符号系统中生存的,符号系统就是社会个体对构造世界发挥作用的产物,符号系统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建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在一定限度内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让世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前进。乡村博物馆是乡村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并在乡村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博物馆依托文化优势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更加有利于自身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运作。通过符号权力影响乡村社会主体,从而凝聚更多的文化观众完成文化扩大再生产。博物馆在传播文化知识、凝聚文化观众、聚揽文化人才进而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壮大文化符号权力,建构乡村文化市场。博物馆在传播文化信息过程中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是专断性选择决定了服务对象的选择。博物馆传播文化信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博物馆呈现的文化资源首先经过了博物馆设立主体的价值过滤,即决定什么可以传播和什么值得注意。在布尔迪厄看来,符号权力是在诱导一种“误识”,即权力将自身所定义的意义强加到信息接受者身上并使之成为信息接受者所认同的信息,而且将这种认同转化为对符号权力主体的认同。因此,博物馆传播的信息,表面上看是客观化的东西,但实际上是信息传播主体基于自身价值观做出选择的倾向性传播。博物馆在信息传播内容方面的专断性,导致信息传播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信息服务对象视野中的内容,信息服务对象只能在“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条件化选择,信息服务对象的选择权受到遮蔽。其二是信息传播方式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为以下几个层面:展品以具象化的实物方式呈现,展品间缺乏空间联系,展品的呈现受到空间约束。博物馆呈现的文化信息将知识切割为“块”,各“块”之间彼此孤立,信息接受者在博物馆中感受到知识的“区隔感”。博物馆呈现的碎片化的知识不能在捕获的信息间建构起知识的逻辑,因为博物馆呈现知识的“选择性”前提已经融入了知识呈现主体的意识,只有对博物馆呈现知识信息的客观性祛魅^[12]才能理解符号权力在博物馆作为信息传播主体中扮演的角色。其三是信息传播倾向于符号权力阶层。博物馆呈现的文化信息倾向于传达符号权力阶层的语言,该阶层的语言更加具有符号权力影响力,符号权力影响力并非靠真理的力量,而是靠周而复始地语言复制和重复训练形成。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系统本质上是外部社会强加于个人的,因此孩子学会说话的过程不是知识真理性影响的结果而是重复训练的结果^[13]。

2. 文化场域的语言基于符号权力选定

文化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语言是被权力选定并被场域内的成员所普遍认同的结果。信息的传输过程,并非对语言进行编码和解码那样一个简单过程,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文化场域内的信息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在文化传播主体主导下先进行信息过滤,而后使信息传播主体价值观得以实践化的过程。因此,信息传输过程是在权力影响下融入了权力意志倾向性的意志表达过程。其间涉及文化受众的信息解码能力,只有达到信息解码能力最低门槛的社会个体才有资格接受文化熏染,并成为文化传播的节点和成为拥有符号权力的主体。这就意味着,文化信息的传输过程会更多地借用学术语言表达风格,这无异于提高了理解文化信息的门槛,掌握文化资本的阶层更有能力进行文化解码,从而在学术空间内更容易理解文化内容。博物馆虽

然表面上向公众平等开放,但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对文化的解码能力存在差别,拥有文化资本优势的阶层更容易在参观博物馆过程中占据优势,从而能够再生产其文化资本优势,符号权力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中再生产出了社会结构。

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与参观博物馆的愿望呈正相关,制约民众走进博物馆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经济支付能力,而在于参观博物馆的主观动机。社会主体必须具有相关背景知识且具有对该文化信息的解码能力和主动接受相关文化熏陶的愿望,才能主动接近博物馆并接受博物馆文化的熏陶。文化力对人的影响在于,越能主动感受到文化力影响和主动接受文化力影响的人越能强化文化符号权力。这种文化需求越能得到满足,个体就会在这种满足中得到积极强化,越不主动接近博物馆从而不能受到文化熏陶,就越不会感受到文化缺失,从而越不能在文化场中享有符号权力。到博物馆中感受文化熏陶,只有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出于预先计划的访问,才能在不同文化信息方面上升到理性思考。因此,社会主体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无疑就形成其接近或者远离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进一步决定了其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在这个逻辑下,位置具有生产位置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位置的相对稳定性。

3. 人群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依据符号权力决定

博物馆基于文化编码力已经将文化影响群体进行了分层,但是基于这种区别标示出来的社会成员差异和基于这种差异而划分的能够享受的文化信息的等级被其客观的中立表象所掩饰。博物馆虽然表面上对所有观众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在以观众基于历史逻辑形成的符号权力进行人群分类。社会个体因其拥有的既有文化资本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解码力,从而在观看同一个博物馆后的所得存在差异,即具有不同文化权力的社会主体在接受同样的文化信息时,从中捕获的文化信息存在差异。在这样的逻辑下,具有文化优势的阶层继续持有文化优势,处于社会秩序下层的个体继续停留在既有的位置上,博物馆创造的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继续生产出不公平的社会秩序。

博物馆表面上的平等遮蔽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样看来,博物馆在符号权力的生产及符号权力在建构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如果单纯从现象角度考虑问题,就被博物馆的中立、客观的表象所遮蔽;只有深入符号权力层面考虑问题,即从动态的受各种扰动因素影响的关系中考察博物馆,才能充分认识博物馆在建构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认识博物馆在建构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不能把已经脱离了本质的表象的东西作为本质的东西加以褒扬,只有祛魅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才能把握博物馆外在的公平背后的不公平本质。博物馆从最初以私人为主体的开设和以为小众服务转变为社会办馆、国家办馆,致力于为大众服务,虽然博物馆的公共性、客观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但人们对博物馆的产生兴趣和从中获得信息的能力的历史逻辑并未改变。博物馆是推动知识共享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但也成了进一步稳定符号权力的助推器,博物馆没有刻意推动人群分化,但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个体,从博物馆中抽取知识的能力进而生产不公平社会秩序的因素客观存在。

从理论上讲,文化场域并非固定不变,但其中存在着将社会阶层区隔固定化的因素,这需要在全社会内提升民众的文化鉴赏力和文化审美水平才能逐步解决这种情况。根据以上分析,文化信息的呈现形式以其形式上的客观性掩盖了实质上的非客观性。因为文化消费主体基于历史的逻辑拥有的文化符号权力存在差异,文化的兴趣点、文化信息的捕获力和传播力存在差异,从而壮大自身的文化符号权力的能力实际上已经在既往区隔出来的位置中被固化,即既有位置上的社会成员不易从图1、图3、图4中“相对左下方”的位置跃升到“相对右上方”的位置。符号权力乃至文化布局的这种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空间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场域主体将专注力聚焦在经济层面,并且经济资本较弱且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率较低时,乡村

文化就会长期低位徘徊。

五、文化符号权力影响下乡村文化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根据前文,符号权力既是一种基于历史逻辑形成的分配和拥有包括文化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的权力,也是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文化资本进而拥有更强社会竞争力的权力。符号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可以不断生产出来的生产力,也是一种在静态中能够影响资源空间布局的力量。拥有符号权力的社会主体倾向于保持和进一步巩固这种布局,而不具有符号权力优势的弱势群体则力争重新建构这种布局并期望在建构新布局中拥有更多的符号权力,但这样的进步过程显得非常困难。虽然 P^P 在乡村文化发展布局中扮演着引领角色,但“ $Q^Q+R^R+S^S$ ”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只有将乡村社会的文化场域与村民的生活场域完美套叠,才能让乡村文化发展具有充分的力量支撑。

(一) 乡村社会主体发展乡村文化的愿望得以唤醒

根据前文,乡村社会主体因在持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基于符号权力拥有的资源分配力存在差异,因此在唤醒乡村社会主体发展乡村文化愿望的过程中,必须针对不同社会主体实行差异化的激励措施,才能激发乡村社会主体的文化消费愿望,将文化力转化为村民的发展力。 P^P 是发展乡村文化的引领者,是在政府引导下发展乡村文化过程中将政府意志转化为村民行动的中间环节。文化编码需要先通过 P^P 解码,辐射到 Q^Q 、 R^R 、 S^S ,转化为村民的生活话语,使发展文化的政策、术语、理念具有村民生活中的烟火气。发展乡村文化需要在文化产业化和发展文化实体经济中进行。但是有些问题在发展中产生,城市与乡村间的文化冲突、非遗保护的制度困境,以及数字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等都会扰动乡村文化发展的既有样态,因此,乡村文化IP就成为统一城乡关系、在发展中保护非遗,以及重构个体在秩序中的位置的重要力量。

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的生产函数也在重塑。乡村文化的发展样态是受愿望、能力、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函数。 P^P 是“能力强—愿望强”, Q^Q 是“能力弱—愿望强”, R^R 是“能力弱—愿望弱”; S^S 是“能力强—愿望弱”。只有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强带弱”和“将弱变强”,才能实现乡村社会主体的生活场与文化场完美套叠。因此,需要对 Q^Q 和 R^R 实行激励措施,并对 S^S 实行鼓励措施,才能迅速壮大发展乡村文化的社会主体队伍。根据前文, Q^Q 、 R^R 、 S^S 并非整齐划一,及时发现并筛选出这些个体中的“中”“中上”和“上层”群体,才能在迅速积累经济资本的基础上积累文化资本,提升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拓展文化服务的空间和丰富文化服务的内容,处于社会秩序中不同位置的村民都能够从文化服务提供的菜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部分。

(二) 基于文化力量重构乡村文化场和符号权力空间布局

文化植入是政府主导下在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布局形式,植入的文化实体在融入本土乡村文化的同时,也体现了政府传播文化的意志,在保留传统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借助现代化的文化表现形式,增长了文化在乡村场域内进行拓展的张力。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植入,目的在于让乡村社会主体有均等化的机会接触文化、感受文化,有愿望发展文化并在文化发展中促进自身发展。文化植入在提升村民文化认知水平基础上增进文化认同,为乡村文化现代化和产业化奠定基础。行政力量拥有强大的符号权力,决定着乡村文化的发展样态。乡村社会需要在行政力量引导下,挖掘本土文化,创新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呈现方式,并通过文化产业化和以文化为节点整合乡村实体经济发展。

乡村文化场基于历史逻辑建构,文化场域内个体拥有的符号权力以及符号权力的文化资源布局相对稳定,但行政力量可以使乡村社会主体迅速增长符号权力,并重构乡村场域基于符号权力形成的社会秩序,村民提升位置的愿望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在这种发展逻辑中, Q^Q 、 R^R 、 S^S 在文化场域内的位置都普遍得到提升,通过图1中合适的发展轨迹上升到P区的“中”的位置。位置发生了变化的村民逐渐弱化在文化场域内的区隔感,拥有较多的符号权力并激发拥有更多符号权力的愿望和信心,具有与P区中的优势阶层对话的可能,并在对话中表达文化需要的愿望,符号权力从而成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大众化权力。

(三) 基于地域文化符号培育集体文化认同和享有文化权力

前面在论及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权力时,主要是以个体为中心展开论述。但乡村文化场域基于乡村社会主体的文化共识得以形成,因此发展乡村文化需要调动乡村社会主体的集体意识,需要基于地域文化符号培育集体文化认同并让村民享有更多的文化权利。乡村场域内的乡情、乡景、乡物、乡事、乡俗等都是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题材。这些为乡民所熟知并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文化元素,可以成为凝练乡村文化的符号并据此铸造乡村文化地标。乡民因文化地标而在文化发展中受益,乡民在丰富文化地标内涵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强化文化地标的的影响力。符号权力因而成为乡民基于文化地标而掌握的共同权力,村集体成为掌握文化地标和拥有符号权力从而让乡民受益的代言人。

因而,文化符号权力是基于地域文化形成的通过村镇等实体组织呈现的为乡民集体共有的权力,这种符号权力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并受村民集体意识影响;或者在发展中强大,或者在时间流逝中式微。在城乡二元经济被打破和乡村存在“空心化”情况下,如果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的融合度不够高,乡民受物化价值观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的进程就会受阻。乡村场域的经济资本积累速度以及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率的提升就会受阻。因此文化地标的建设不能剥离其中的经济因素,文化资本作为经济资本的函数也会影响经济资本的发展样态。文化话语转化为经济话语从而成为拥有分配资源的符号权力,才能为 Q^Q 、 R^R 、 S^S 将经济资本翻译为文化资本并转化为适合自身的符号权力,才能在不同向度上推进乡村文化发展。

(四) 基于地域文化符号打造文化项目和发展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乡村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乡村文化的呈现形式也不能固定不变。发展乡村文化,需要将文化的理论话语转化为乡村社会主体的生活话语,乡民要在具体的文化形式中受益,从而感染文化力量和激发参与热情。

因此,发展乡村文化需要将文化政策运用到具体场域中。村民需要的不是发展乡村文化的口号和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证,而是需要能够转化为村民行动的具体办法,在发展中感受符号权力和拥有符号权力。将发展文化的理论话语转化为村民生活话语的最好形式就是将文化符号落地为文化项目,文化发展思想从而具有可操作性。村民在文化项目中可以明确地看到文化发展目标、发展措施、发展轨迹、发展制度和发展时间表。鞭策政策供给主体积极推进工作,激励文化发展主体积极参与建设,在乡村社会形成发展地域文化的浓厚氛围,在各个环节汇聚乡村文化人才,将行政意志转化为村民行动,将个别的村民意愿扩展为大众化的村民意愿,使村民充分享受文化符号权力。

通过项目推进,可以使基于标准化的话语方式在不同主体之间精准传达信息,避免因信息传输不准确造成误解,影响乡村文化建设的效率和效果。项目制的乡村文化发展方式,可以使村民根据自身能力和发展愿望充分介入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模式由行政力

量主导下的“单轮驱动”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轮驱动”。在发展中激发智慧和孵化出更多新项目,不断积累经验和壮大乡村文化发展主体规模,提升经济资本的积累速度和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率,完善基于符号权力的乡村文化发展秩序,在重构乡村社会主体位置结构过程中让位置向“相对右上方”整体平移。

六、结语

符号权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基于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体现文化张力的可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这个权力基于历史继承性具有扩大再生产特征,并使社会成员在社会秩序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位置,社会成员想要打破这种位置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并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处于更高的位置就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就要具有较强的经济资本积累力和较高的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转化率。符号权力在建构社会秩序中具有重要意义。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所处的位置就是符号权力的外化,具有符号权力的个体是“建构中的建构”,也是“被建构的建构”。具有符号权力的个体在与他者打交道过程中实现个人意志和建构自己的意志,并为“他者”意志的实现创造条件,个人意志的实现也是他者实现意志的条件。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个体在文化发展中具有充分的话语权,从而拥有更大的符号权力。

处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坐标系第二象限、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中的个体都具有向第一象限发展倾向,但是个体在发展中由于各种扰动因素会停留在发展的道路上而不能达到第一象限。乡村场域内的文化发展贯穿着符号权力左右社会结构建构的力量,符号权力既要体现着行政意志,也要体现乡村社会主体的意志,文化场与乡村社会主体的生活场据此才能实现完美套叠。行政意志基于符号权力决定着乡村文化的最终发展方向。政府所具有的符号权力中需要充分融入乡村社会主体的力量,这样村民发展文化的愿望才能上升为行政意志并以政策方式反馈到乡村文化场,村民发展文化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才能得以激发。既然如此,发展乡村文化,就需要重视基于历史逻辑形成的符号权力,并通过提升乡民的文化素养,让符号权力由小众权力转变为大众权力,从而汇聚发展乡村文化的智慧和动力,增强发展乡村文化的现实生产力。

参考文献

- [1] 燕道成,李菲. 场景·符号·权力:电商直播的视觉景观与价值反思[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6):124-129.
- [2] 何少娴,尤泽顺. 建构、场域及符号权力:布尔迪厄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J]. 东南学术,2017(6):226-232.
- [3] 章兴鸣. 符号生产与社会秩序再生产: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政治传播意蕴[J]. 湖北社会科学,2008(9):50-52.
- [4] 甘代军,李银兵. 符号权力与自由幻象:中国礼物馈赠的符号权力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2012(6):20-23.
- [5] 傅敬民. 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评介[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6):104-117.
- [6] Bourdieu. 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178-190.
- [7] 高丽华,吕清远. 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网络媒体投身社会公益的祛魅研究[J]. 新闻界,2017(7):58-62.
- [8] 张意. 符号权力和抵抗政治:布迪厄的文化理论[J]. 国外理论动态,2003(3):30-35.
- [9] 刘沙. 博物馆场域中符号权力与公共性理念的张力:基于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考察[J]. 东南文化,2022(1):165-170.
- [10] 石义彬,熊慧. 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J]. 湖北社会科学,2008(2):171-174.
- [11] 布尔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140.
- [12] 胡春光,杨宁芳. 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思想除魅: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J]. 外国教育研究,2005(7):10-13.

[13]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 译. 北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6.

Social Order and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Symbolic Power

MENG Xiangl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3, China)

Abstract: Symbolic power refers to the right of individuals with cultural capital advantages to obtain more discre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joy resource benefits while constructing social order. Individuals tend to strive for more symbolic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ir own position in social order. However, it is arduous to break existing social structures and reshape new ones. Individuals may assume multiple form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new positions. But each form is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self-cultivation and games with others. Therefore, symbolic power essentially entails the authority to allocate, appropriate and develop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villagers are key actors in developing cultural symbols, but symbolic power must be expressed through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ransformed into productive forces for developing rural econom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will. Developing rural culture requires constructing cultural landmarks based on symbolic power, developing cult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cultural symbols, and facilita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essential to accumulate economic capital in rural society and enhance the conversion rate of economic capital into cultural capital, stirring up the desire of rural residents to foster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ymbolic power; rural culture;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patial layout; development shift

[责任编辑:王建霞]